



广府文化丛书·和飞 赵克生 主编

阮元学术思想研究



钟玉发 著



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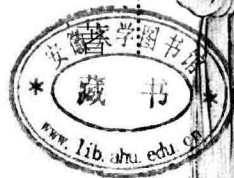


广府文化丛书·和飞·赵克生 主编

阮元学术思想研究



钟玉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阮元学术思想研究 / 钟玉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161-2935-7

I. ①阮… II. ①钟… III. ①阮元(1764~1849)—学术思想—研究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479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韩 丽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25
插 页 2
字 数 287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生平与学术渊源	(23)
第一节 生平	(23)
第二节 学术背景与渊源	(30)
一 学术背景	(30)
二 学术渊源	(33)
第二章 考据学成就与思想	(42)
第一节 考据学成就	(42)
一 古名物之考证	(42)
二 古典制之释解	(45)
三 古地理之研究	(50)
四 古金石之论考	(52)
五 古文字之训诂	(56)
第二节 乾嘉汉学之总结者	(63)
一 编纂《经籍纂诂》	(63)
二 校勘、重刻《十三经注疏》	(66)
三 汇刻《皇清经解》	(69)
第三节 调和汉学宋学	(72)
第四节 赞许今文经学	(83)

第三章 训诂以明义理	(92)
第一节 训诂以明义理	(92)
一 乾嘉学者的“义理”观	(93)
二 阮元对若干儒学核心概念的阐释	(99)
第二节 “实事求是”与“以意逆志”	(109)
一 “实事求是”与“以意逆志”	(109)
二 治经“违注”	(112)
三 发明义理中的缺失	(115)
四 “训诂”与“义理”的矛盾	(121)
第三节 “字学即经学”及其极限	(123)
一 阮元的考据学思想	(123)
二 “字学即经学”的极限	(127)
第四章 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与实践	(132)
第一节 经世之主张	(132)
一 明清经世思潮与阮元“稽古”“资治”论	(132)
二 “圣贤之道,无非实践”	(137)
第二节 学术经世之实践	(142)
一 学术与日常政务的结合	(142)
二 注重科技质测之学	(149)
三 重视治史及其经世的功用	(161)
第五章 诂经精舍、学海堂与晚清学术流变	(171)
第一节 诂经精舍与浙江学风	(171)
一 诂经精舍	(171)
二 训诂考据之学的传播	(174)
三 实学经世思想的流行	(179)
第二节 学海堂与岭南朴学的蔚起	(183)
一 学海堂	(183)
二 岭南朴学的蔚起	(187)
三 今文经学的探研	(194)
第三节 陈澧及其汉宋学调和论	(201)

一 身逢乱世,学求有用	(203)
二 批评汉学末流学风空疏	(206)
三 改造和重振汉学的对策	(211)
四 并尊郑朱,调和汉宋	(214)
五 道德救时与实学经世	(223)
 结语	 (227)
 附录 徐光启与阮元科技思想之比较	 (236)
 参考文献	 (257)
 后记	 (268)

绪 论^{*}

阮元是清代“名臣”，少年早达，仕途一帆风顺，历仕乾、嘉、道三朝，官列“九省疆臣”、体仁阁大学士，晚年晋加一般在死后才能追封的“太傅”之衔。除嘉庆十四年（1809）因受浙江学政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一度被革职之外，阮元一生几乎未再受到任何政治挫折。而且他持身清慎，为政处处以合清廷最高统治者利益为目标，又善于处理日常政务，务令“实惠在民”，居官时间竟达50年之久。阮元虽然为显宦，但是他自幼年之时就发奋向学，成年之后又勤于著述，不仅在经史、小学、天文历算、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精深造诣，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就，而且宦迹所至，致力于倡导学术、兴办教育、培育人才和刻印书籍，对于推动清代学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他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八月至道光六年（1826）六月在两广总督任上作出的贡献尤其令人瞩目。此时的阮元不仅本人的学术研究进入成熟与总结时期，而且充分利用自己的名位不遗余力地推动广东文化的发展。概括起来看，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阮元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创设学海堂，端正士风、文风与学风，不仅树立了良好的考据学风范，使广东成为汉宋学调和的中心，而且培养了包括“岭南两大儒”陈澧和朱次琦在内的大批岭南学术人才。其二，主持编纂《广东通志》，旁征博引，考订精详，使之成为广东历代省志中的“善本”。其三，汇刻《皇清经解》，全面总结清代学者的经学研究成就，嘉惠士林，弘扬传统文化。梁启超曾

^{*} “绪论”中所出现的著作、论文的出版（发表）时间、出版社以及杂志名均参见全文后的“参考书目”。

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对阮元在广东倡导学术、刊刻典籍和兴办文教事业等方面的重要贡献赞许说：“阮芸台督粤，创学海堂，辑刻《皇清经解》，于是其学风大播于吾粤。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粤转盛。”由此可见，阮元其实亦仕亦学，是一位十分典型的所谓官僚型学者。因此，肯定其“事功”的一面固然必不可少，而研究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也自有其重要意义。

从学术地位来看，阮元为乾嘉汉学的“殿军”，在考据学领域中成就巨大。阮元的考据学思想继承惠栋、戴震，与同时代或稍后的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相近，但有其独特之处。如果不研究这些个性特征，则不能完整地了解整个乾嘉汉学甚至清代学术史。况且乾嘉考据学是继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之后出现的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学术思潮。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惠及后世，而其研究问题的方法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吸取和借鉴。阮元既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又是其“护法者”，因此，研究其学术思想对于我们完整地掌握乾嘉考据学的脉络乃至清代学术史、思想史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阮元生活于清代由盛转衰、中国由“古代”向“近代”演进的时代，其时西学在东渐。阮元学术思想中所透现的传统士大夫的儒学观念根深蒂固，然而他在持“西学中源”说的同时，又能一定程度上肯定西学的先进性，主张会通中西之学。这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具有参考意义。

当时人、近人以及今人虽然对阮元的各个方面均有研究，然而值得深入探讨甚至重新思考之处尚有不少，其中，加强对其思想与学术的研究就十分必要。

二

阮元身为显宦而又不废学术，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其生平、宦绩和学术成就与特色的论述也相对较为丰富。迄今有关研究阮元其人其事其学的专著有三部，专题论文六七十篇，这些都为本研究奠定了有益的基础。但由于受到时代、资料以及理论方法等的制约，这些已有成就又显得不足或不尽完善。试按三个时段，对其加以概述和评析。

（一）1949 年以前

对于阮元的研究早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开始了。例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曾撰写《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将阮元的学术成就概述为训诂、校勘、目录、典章制度、史学、金石、九数、文章、性道、掌故十个方面，称赞他“性儒风，励精朴学，兼万人之姿，宣六艺之奥”。阮元之弟阮亨则在《瀛舟笔谈》中对其兄的考据学成就、编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畴人传》、《金石志》等书，以及所作《曾子十篇注释》等进行了总结，阐明了其“不敢存昔人门户之见，而实以济近时流派之偏”的学术特色。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阮文达公事略》在记述阮元生平事迹的同时，也称赞了他作为官僚型学者的特点，认为“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清史稿·阮元传》则高度评价了他在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说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但是，这些文献以及一些所谓“乡贤录”、地方志等，颂扬的成分大，却未对其学术成就与思想做具体研究。

1914 年，王棻《柔桥文钞·读阮文达性命古训》算是较早时期对阮元学术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章。该文认为，《孟子》等古书皆以情为阳、性为阴，且两者为对。但是，阮元在《性命古训》中却将情括于性，这不仅与佛、老无异，而且也违背了许慎、郑玄之说。

1920 年，梁启超著成《清代学术概论》，认为阮元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考据学“正统派”之“护法”。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虽然对于阮元主持编纂《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畴人传》等多所肯定之词，但是他对于段、二王等人的学术成就的论述远多于阮氏，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认为阮元在学术成就上不如戴震，但推广力很强，广东近代学风皆“由他一手开出”。

刘师培在《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和《扬州前哲画像记》中曾指出：阮元师从戴震的嫡派传人王念孙问学，与凌廷堪、程瑶田、焦循等互为师友，为学“异于恒订猥琐之学”和“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又在《理学字义通释序》中详论其事说：“近世东原先生作《孟子字义疏证》，据《孟子》以难宋儒，而甘泉焦先生亦作《论语通释》以继戴氏之书，仪征阮先生病宋儒高谈性命，作《性命古训》，并作《论语·孟子论仁论》，皆折衷故训，不杂两宋之书。及定海黄式三先生作《经训比义》，虽私师淑阮氏之学，然立说多调停汉宋，与戴、阮之

排斥宋学者不同。”

王国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则指出，戴震、阮元两人在乾嘉之学兴盛之际，意识到其庞杂破碎之弊，复提孟子以来之人性论，分别撰成《孟子字义疏证》和《性命古训》。他们两人意在申明三代秦汉之际有关“理”、“性”等关键字的古义，其功在于“以宋儒之说还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三代”，并对唐宋以来杂以老、释之“新学”进行了攻击。

1925年，胡适写成《戴东原的哲学》，将阮元与颜元、戴震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阮元不仅能继承戴氏考训之学，而且他最擅长从训诂名物入手，利用比较归纳的方法，指出古今文字意义的沿革，剥去后人的见解，回归古代朴实的意义。阮元十分注重实践，其对“习”、“顺”、“达”、“贯”、“格物”等字义的训诂都反映了这一立场。因此，其学术思想与颜元有相近之处，甚或受到过其影响，然而这却不是戴学的精神。阮元论“性”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的方法而不在于结论，他的方法就是依据时代先后用举例的方法排列比较文字字义的变迁沿革，剥除后世之异见，这与戴学精神较为相近。由于在学术实践过程中，颜元、戴震、阮元等都不同程度地反对理学，因此，他将从戴震到阮元称为“新理学时期”。

刘师培、王国维、胡适三位皆为知名学者，他们对阮元的论述言简意赅，颇为深刻，至今仍有影响。但他们结论式的评述较多，而具体剖析却不足。

1930年，顾颉刚在《阮元明堂论》中认为所谓“明堂”不见于《诗》、《书》、《易》和《春秋》，而始见于《孟子》。孟子以古时齐国所建的这一建筑傅会为“王政”，本意在于劝导时君行“王政”。而后世（包括阮元在内）则确信“明堂”为古帝王遗制，进行了各种牵强附会的考释和诠释，结果，以讹传讹，实失明堂之本来面目。

1934年，容肇祖《学海堂考》从学海堂创建人、建制、规制、学长、专课肄业生、所刻书以及《学海堂集》选取人名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考实，成为研究阮元所创建的这一异于当时一般书院、以传授朴学为鹄的的著名学府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1935年，全汉昇发表《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一文，认为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始作俑者是清代著名数学家梅穀成，后来这一说法得到《四库全书总目》和康熙帝的肯定。阮元编纂《畴人传》时对这一说法着

力加以鼓吹，并将源出中国的西学的范围扩大开来，认为不仅代数出自天元法，而且《曾子十篇》等是西法的先导。

1936年，张崑撰写了《诂经精舍志初稿》，对诂经精舍进行了专门研究。原定分八章，现所见仅弁言、沿革和规制三部分。在“弁言”中，张崑肯定了诂经精舍创立一百余年间，在推广朴学、培育人材、改良教育以及奖掖学术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在“沿革”中，他考实了诂经精舍创建、重修时间等，又在“规制”中论述了该书院的统系（相当于当时浙江“省立大学”）、宗旨（专主汉学）、员数（包括掌教和生徒）、程式（课试经史，旁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术词章）、经费以及刻藏图书等情况。同一年，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认为，阮元创设诂经精舍、学海堂，以考证训诂之学为宗，兼及天文历算之学，要求士子根据个人的志趣选择所业，这含有分科之意，对于近代学堂的产生和规制的形成发生了重要影响。

1937年，钱穆著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在该书第10章《芸台论学宗旨》中指出：阮元之学风源于戴震，主古训明而义理明之说，长于归纳，“颇主求义理，故渐成汉宋兼采之风”。他在肯定阮元的贡献时，也批评其“必以最先之古训为贵，则追溯古训来源，必有穷极。且何以最先之古训，即为最真之义理乎？此尤无说以解者。而义理自古训中来之意见即无形摧破，而芸台不之悟也”。

1940年，傅斯年著《性命古训辨证》，对先秦时期各家对“性”字的用例进行统计、归纳和分析，结论认为：阮元《性命古训》中论“性”的结论多不正确，但是阮氏的方法——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的问题却值得肯定。

1940年，仰弥在阮元卒后90周年之际发表《阮文达事迹》，指出：阮元继承汉学院派之学旨，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不主门户之见，名位著述弁冕群材。具体来说：阮元为学主张“实事求是”，却又对敢于违背郑注的焦循等表示推崇；亲炙王念孙、任大椿和邵晋涵等，继承了汉学由训诂明义理的学旨，在小学方面多有建树；发凡起例，编撰《国史儒林传》，论学不分门户，务取汉宋之平；其在金石学方面所做的十件事“实开近百年来斯学之先河”；在校勘《十三经注疏》时，广征善本，剖析源流，参互考订，罗列异同。最后，总论其为学特点曰：“尤以发明大义为主，如所著《性命古训》、论语孟子论仁论、曾子十篇注，推阐古圣贤训

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可身体力行……”

此外，1931年默记与1932年杨寿昌的同名文章《陈兰甫先生澧遗稿》以及1937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别指出：清代广东朴学的兴起和发展、著名学者陈澧及其东塾学派受到了阮元的学术思想以及他所创设学海堂学风的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对阮元的研究虽然比较丰富，但是，多集中在颂扬这位“名臣”的政绩上，而其学术成就与思想却成为次要的方面。虽然刘师培、王国维、胡适等对此有过涉猎，但是结论性语言多于具体探讨。又由于受到时代、阶级立场和观点、方法等的制约，这些研究存在不足之处，有可作微观具体研究、可商榷甚至应重新加以讨论的问题。

（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这一时期对阮元的研究相对较为沉寂，近30年时间里几乎没有见到相关论文出现。不过，60年代中期以前出版的几部专著中，涉及了对阮元学术思想和成就的研究，而且其中也不乏创建和见地。

1956年，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15章《阮元的思想》认为：“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但是，“阮元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史料辨析者”。他在论述阮元继承汉学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方法时指出，这是乾嘉汉学的精神所在，但是在哲学上没有价值。一方面，阮元作为封建大臣不敢公开攻击被立为官方正统哲学的程朱理学，另一方面他又崇拜汉学，信仰汉儒的材料。侯外庐还肯定了阮元在文化史论述方面的成就，表现为：（1）探讨语言文字源流，以为语言是文字所从出，而文字“义生于音”；（2）引用金石铭文佐证经说；（3）用归纳法统计出来的材料研究古代文字与思想，但由于他不区别时代，故往往不够正确。例如，他未能正确诂出“性”、“达”、“仁”等在特定时代的意义。阮元由考据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有力地反对了宋儒，但却不是科学的思想史研究。他既没有颜元、汪中的锋芒，更没有戴震的激昂。他在汉学已经衰微的时候，开设书院，提倡为汉学而研究汉学，这是他作为封建贵族阶级的保守性的表现。

1962年，香港商务印书馆《艺林丛录》第三编发表了一组研究阮元的文章。桐花《阮元在粤二三事》指出，阮元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注意文化学术的培养与传播，不仅创办学海堂，倡导朴学学风，而且主持编

纂了大型经学丛书《皇清经解》，刻印了《通志堂经解》以及《十三经注疏》、《四库总目提要》、《经典释文》等。字翁《阮元与学海堂》对学海堂首任八位学长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认为他们均为“一时俊彦，学有专长者”。而学海堂所培养出来的学者如张维屏、谭莹、陈澧等著述丰富，名垂史册。字翁《阮元·曾钊·陈澧》详细考实了阮元偶于坊间巧识曾钊的逸闻以及岭南著名学者陈澧深受阮元影响、“学综汉宋，精通经史天文地理音律算术，为清季东粤硕儒”的历史事实。

1962年，张舜徽出版《清代扬州学记·阮元》论述说：（1）由于阮元远尊戴震，又受到王念孙等影响，故为学主实事求是。与焦循长于演绎相比，阮元则擅长归纳，这在《性命古训》一文中得到充分体现。阮元学问渊博，是扬州学者中的巨擘。他又能对汉宋之争持调和立场，从而对陈澧等后学产生深刻影响。（2）阮元在训诂学上的成就表现在他善于运用“因声求义”之法探究语源、寻求文字本义等，又编纂了极有价值的训诂学工具书《经籍纂诂》。（3）阮元撰写了《考工记车制图解》、《浙江图考》、《明堂考》等图文并茂、见解独到的考证学著作。他还运用金石铭文考证经史。（4）阮元很想通过训诂和考证，再进一步推求义理。例如，他将“格”训作“至”，“物”作“事”解，主张凡事应亲身实践。这“自然是针对着元明以来空谈心性的理学家们坠入玄虚的流弊提出的”。其方法是：以佛家之说还之佛家，以宋儒之说还之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之三代；目的是使学者们明了古初义理之原，不致为后世诸说所乱。

1964年，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下册）《阮元的学术思想研究》认为，阮元虽然是封建大官僚，却有一些反对理学的短篇论文和唯物主义倾向。由于生活于1840年前后、清朝由盛转衰和内外交困之际，所以阮元一方面看不起西法，同时又一定程度上承认西法的长处。阮元为学反对玄虚、空想，提倡实用、实行、实践，不过，他没有公开批判理学、反对程朱。阮元还将“性”释为“气质之性”，如同戴震一样肯定了人的情欲的合理性。理学家以“生生”解“仁”，以仁代表宇宙，而宇宙只是一个玄虚的生。阮元却以平实的语言将“仁”释为“相人偶”的社会伦理关系和克己的功夫，并批判了王阳明良能、良知说。就学术成就与方法而言，阮元处于二王之间，承前启后，其本人的著作中已体现出近代气息。他不是单纯的音韵训诂学家，而是在训诂中追求义

理,并且“张‘汉帜’,拔‘宋帜’”。至如段玉裁、王引之等为考据而考据,是没有思想内容的考据家。

(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这一时期对阮元的研究不乏时有力作涌现。所出版的专著有三部,见诸学术期刊的论文则更多。其中对于他的学术成就、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最为丰富。

1. 学术成就与地位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阮元学术成就与思想的研究尤为重视。其中,1997 年,李成良出版《阮元思想研究》。该书从政治、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及书学、科技等方面剖析阮元的思想,是目前第一部比较全面地研究阮元思想的专著。该书书末还附有“阮元学术交游考”和“阮元生平纪要”,对于全面认识阮元及其学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者认为,就阮元著述的成果而言,见解独到,硕果累累,显示了其宏大的治学规模和学术气象,同时他又扮演了乾嘉学术总结者的角色。阮元不仅继承了汉学皖派的传统,而且与各个不同派别的学者交游,故能破除门户之见、力持学术之平。就其治学特点来看,主要体现为遵循“实事求是”和讲求“明体达用”。

1987 年尹协理《略论阮元的“实事求是”之学》认为,阮元的“实事求是”之学反对理学末流空谈天道与性命,歪曲经文原义的学风。阮元把八股文称为“空文”、“虚学”,而把考据训诂方法称为“实学”,并竭力提倡这种“实学”。阮元提倡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研究经学,当从注疏开始;研究注疏,当先从训诂开始;欲明训诂,又须从声音文字开始。这种治学态度是客观的,具有朴素的科学精神。该学风的意义在于:(1) 主张不能只读程朱陆王等理学家的书,而主要应读《四书》、《五经》以至整个十三经;(2) 不能随意从经典中发挥义理,而应该首先追寻经典的原义。因此,其学术思想中洋溢着抑宋色彩。不过,阮元等有否定哲学与理论思维的倾向,有时不免陷入烦琐考证而不能自拔的困境。

1992 年黄爱平《阮元学术述论》认为:(1) 阮元学术主张和治学风格是:尊汉抑宋、实事求是和折中汉宋。(2) 学术成就:在经学方面,比较成功地实践了由文字音训以明经达道的治学宗旨;在小学方面,考释文字本义与编纂训诂工具书《经籍纂诂》;在金石方面,收集、整理和保存古器古物,进而加以研究;在天文历算方面,主持编纂了《畴人传》。

(3) 创设诂经精舍和学海堂, 提倡学术, 奖掖人才; 又主持编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和《皇清经解》等。因此, 他是名副其实的乾嘉汉学强有力的“殿军”。黄爱平 2002 年《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认为, 戴震与阮元等对由文字音训入手寻求经书义理的治学宗旨的理解并不一致, 学术实践的途径亦有差异: (1) 戴震重视义理, 视之为“文章、考核之源”; 而阮元却从折衷汉宋、兼采二者之长的着眼点出发主张二者不可偏废。(2) 戴震既重视经书文本的客观考证, 又强调并最终归结到个人心志的主观认同; 阮元推崇的是对经书文字、音韵、训诂本身纯客观的考证研究, 致力于探求和阐发的是古圣贤之学。(3) 戴震在疏解“理”时, 并未严守还原古书原义的立场, 而是作了相当主观的发挥, 目的在于批判理学“杀人”, 而阮元极为重视经书文字、音韵本身的客观研究, 强调探寻其中蕴涵的原始义理和圣人之道。因此, 戴震得到的最终结果是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而阮元的最大功绩则是在相当程度上推明了“古训”, 恢复了“古学”, 亦即经书的原义原解。

1992 年郭明道《论阮元对乾嘉汉学的贡献》除论述了阮元在编纂、刻印书籍, 运用金石考经证史, 创设书院, 传播学术的成就之外, 还强调说, 阮元作为一位杰出的考据学家, 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途径, 运用声音的线索, 探求语言文字的源流, 提出了“义从音生, 字从音造”的论断。2006 年郭明道发表《阮元与清代学风》, 将阮元的学术思想与贡献归纳为: (1) 倡导经史实学, 关注国计民生; (2) 创立书院, 培育通经之士; (3) 提倡通儒之学, 主张汉宋兼采。

1998 年余新华《阮元的学术渊源和宗旨》认为, 阮元的思想和方法虽直承戴震的余绪而起, 但不如与顾炎武默契。阮元所标榜的“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以古为是, 即以原始儒学中包含的三代以来沿袭下来的“古制”、“古礼”等经验事实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原则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阮元以考据训诂为说经的工具, 对儒家经典作社会学、伦理学的解释, 其目的是要恢复“古儒家之学”的原始形态, 以发挥其“济世”的功能。

1998 年尚小明出版《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 其中《阮元幕府》探讨了阮幕由包括段玉裁、焦循、臧庸、顾广圻、江藩、李锐、陈寿祺、严杰等著名汉学家在内的 120 余位学者的构成情况, 最后以列表的方式勾画出阮幕在校勘、编纂和刻印书籍等方面的学术成就。2001 年李炳泉《阮元督粤幕府考论》列表考辨说, 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月至道光六

年(1826)六月阮元督粤幕府的规模为42人,阮元督粤幕府的特别之处在于幕宾多为学者。

2006年王瑜《阮元学术思想生成探源》认为,阮元学术思想源自扬州浓厚的学术氛围的浸淫、西学的影响、师友的砥砺以及他本人的努力。

2. 哲学

对阮元哲学思想的研究存在不同见解。前述侯外庐之著认为,阮元是一个史料辨别者,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但1992年出版的王茂等《清代哲学》第22章《阮元的仁学新义》则集中论述了阮元的哲学思想与特点:(1)黜虚崇实,将“太极”、“道器”释为实象,用粗浅的经验性事物代替高层次的、抽象的理论思维。(2)阮元性命论、人性论重要特色在于恢复“性命”等古时含义、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和强调节欲等,其践行、实事的学术主张在社会政治领域里就是提倡礼治、忠孝。(3)释“仁”为“相人偶”,发前人所未发。阮元以扎实的训诂手段、本着以“实”为“是”的精神,还“仁”以原始儒学的本来含义,否定了其神圣性和神秘性;又认为“仁”必须于“行事”中体现,确立了异于宋明儒者的基于社会关系意义上的“仁”学思想。

1992年杨向奎《论“性命古训”》和1996年郭明道《阮元的哲学思想》指出:阮元在批判宋明儒的虚妄之说的同时,认为探求儒家义理的惟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运用训诂的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他将“贯”、“习”和“格物”释为“行事”,提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的卓越见解,在事实上批判了朱熹“穷理”之说。阮元又著《性命古训》批驳唐李翱《复性书》中把“性”和“情”拆离、对立起来以及克服一切情欲以达到复性的主张,认为应该承认人的情欲的合理性。郭文还指出,阮元关于“实践”的见解与颜元的习行观十分相近,反映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2001年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代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一书有关章节论述了阮元的“礼”学思想,认为他有以具体可行的制度和社会规范之“礼”取代玄虚不可捉摸的“理”的倾向。《研经室二集》卷4“次仲凌君传”中曾引述凌廷堪的学术,以为复礼才能复性。阮元对凌氏的主张大加称赞,说明他本人也同意这样的主张。阮元限于自己的身份没有公开批判理学、反对程朱,但是,他间接地否定了“理”说和肯定了人的情欲。

2007年李帆《从“仁”和“性命”之解说看阮元的理学思想》认为，阮元作为汉学家本着“以训诂求义理”的学术理路，从古训入手，通过语义求文字本义，他之论“仁”，是以“相人偶”为解，认为“著于行事，始可称仁”，批评理学家“闭户斋居，瞑目静坐”的体仁之方。他之论“性命”，以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性不能“绝”，只能“节”；规范的标准在于礼治。他对唐代李翱的“复性”说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李翱把“性”与“情”对立起来，是“杂于二氏”、“由庄入禅”的谬见。

2008年吴根友《试论阮元哲学思考的语言学路径及其得失》指出，阮元的语言分析、典章制度研究反映了18世纪中国哲学的实证化倾向，具体表现在：（1）倡言“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将训诂看作哲学思考的方法；（2）认为“心”不是先验的、能知的思维器官，它只有通过和外物接触才能具备知识；（3）通过释“顺”、“鲜”、“达”等，表达其政治思想与人生哲学；（4）诂“仁”为“相人偶”，反映了其道徳哲学思想；（5）探求文字“本义”，体现的是其语言学思想及历史还原主义。

2009年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与清代汉宋学术之争》指出，学界一般认为阮元持调和汉宋学的立场，但是他在嘉庆年间负责编纂的《儒林传稿》实际上是激化汉宋纷争的导火线。由于他在该文中以“汉学”为儒学正宗，因此对江藩《宋学渊源记》产生了影响，并引发了方东树及其《汉学商兑》对汉学的激烈攻击。

2010年姜广辉《乾嘉汉学的殿军——阮元》认为，阮元通过经典文字训诂构建新理论体系（以《孝经》为众经之祖、其所谓“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实际是提倡实践哲学与反对本体哲学），并且在校勘《十三经》时摒弃凭臆“恢复”的古本、拒绝率尔“改正”古书。

2011年陈居渊《汉学与宋学：阮元〈国史儒林传〉考论》认为，阮元依托国史编撰的《儒林传》，总结了清初至乾嘉百余年间汉学与宋学各自走向极端的发展变化，重新发现与评价了被忽视的宋学和今文经学的学术价值。它不再是对传主原有学术思想资料的简单复述与裁剪，而是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体现了学术变动的新趋势。

3. 经学

阮元是清代中期杰出的经学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思想是学界尤为